

加强算法文化适配 激活广货出海新动能

广货行天下 · 理论纵横

2025年,广东外贸出口总额达6.03万亿元,其中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数字平台贸易正成为增长的核心引擎。然而,一个普遍现象值得关注:大量中小微出海企业因文化适配不足,深陷“水土不服”的困境,其市场转化效能与品牌头部企业存在显著差距。

这表明,在数字浪潮下,广货出海的主战场正从传统货架转向由算法主导的跨境平台与社交媒体。产品的命运不仅系于质量与价格,更取决于它能否被算法“精准看见”,并与多元文化“深度对接”。因此,加强算法文化适配,已从技术选项升维为激活广货出海新动能的战略支点。

广货出海正在进入“算法主导”的新阶段

当前,全球贸易的流量入口与交易场景已发生根本性迁移。广货出海的主战场,正从传统展会、集装箱货柜与线下批发渠道,全面转向由亚马逊、TikTok Shop等全球平台,以及像SHEIN这样将运营总部与核心供应链深深扎根于广东的跨境电商巨头所主导,它们共同构成了广货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这些平台的核心运行规则,无一例外均由复杂的推荐算法所定义。一款产品能否成功触达海外消费者,本质上取决于其能否被算法识别、理解并赋予更高的推荐权重。这一转变意味着广货出海的竞争维度已经升级。过去,竞争主要体现在生产成本、供应链效率与设计能力等“硬实力”上。如今,竞争则延伸至对平台算法逻辑的理解、对流量趋势的把握以及更深层次的对数据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偏好的洞察能力上。算法不再仅仅是工具,它已成为塑造市场的关键因素与基础设施。广货出海,已正式步入一个由算法深度定义甚至主导的新发展阶段。

算法文化适配已成为广货出海关键变量

在算法主导的新阶段,算法文化适配这个核心变量日益凸显。它旨在让产品服务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目标市场的算法推荐逻辑实现“双向调适”,这意味着企业需要既调整自身文化表达以匹配算法规则,也要通过精准的文化标签引导算法理解,最终实现高效触达。

这一过程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层面:一是让算法“读懂”产品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如价值观、审美、习俗);二是让产品“适配”算法所服务的特定文化群体。其关键性在于它直接连接了“技术效率”与“市场共鸣”。

因此,尤为重要的是企业需要通过主动调整与优化产品服务中的文化表达,使其更契合目标市场的认知习惯,从而被当地算法系统更有效地识别和推荐。比如,像美的这样的广东家电品牌在开拓欧洲市场时,会将其产品功能与“可持续环保”“节能设计”以及“家庭共享场景”等当地主流价值观深度绑定,从而更有效地被算法识别并推荐给目标客人群。实践中也不乏教训,例如一些出海企业曾因对东南亚等市场的色彩、图案禁忌了解不足,导致营销内容被平台算法判定违规,从而错失商机。这些案例表明,算法文化适配,已成为决定广货能否从海量商品中被精准“打捞”出来、与消费者建立情感连接的关键转换器,更是其从“出海”到“扎根”必须成功架设的核心桥梁。

算法文化适配的实践现状与动能制约

当前广货在算法文化适配上的实

践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面临多重制约,严重掣肘了新动能的充分释放。这一困境,反映了企业战略认知与具体落地能力之间的脱节。

从实践层面看,“点高面低”的格局已然显现。部分头部品牌和大型跨境电商企业已组建专门团队,利用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市场洞察,并积极推动广告素材与详情页面的本地化优化,在特定市场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占广货出海主体数量的广大中小微企业,绝大多数仍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它们普遍缺乏专业人才与技术手段,对平台算法的理解流于表面,出海营销往往停留在简单的语言翻译和价格调整上,无法进行深度的文化适配,导致品牌溢价难以提升,市场开拓后继乏力。

究其根本,主要制约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技术门槛高,自建或采购专业的文化数据分析与内容生成工具成本高昂;二是知识壁垒深,对目标市场的宗教禁忌、社交礼仪、审美变迁等隐性知识缺乏系统、可靠的获取渠道;三是生态支撑弱,市场上尤其缺乏针对广货细分品类(如家电、家居)的即开即用式的标准化文化适配解决方案与普惠性公共服务,致使企业各自为战,试错成本高。这些相互交织的制约,使得算法文化适配能力未能转化为广大出海企业的普遍动能。

系统性推进算法文化适配的多维构建

要将算法文化适配从“头部企业的利器”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能”,必须从企业单点尝试转向系统性的能力构建。这需要政府、平台、行业与企业四方协同,在多维度上共同推进。

首先,共建“文化基因”数据库,破解“知识壁垒”。可由省级商务部门牵头,依托广东省“贸易数字化领航区”建设,联合高校、研究机构及头部平台,共建面向出海企业的重点市场文化信息库。该库应分阶段、分区域动态收录各

市场的消费趋势、网红词汇与禁忌红线等“文化基因”,并将其转化为可供算法识别的结构化标签体系,为企业提供精准、可靠的“文化地图”。

其次,开发“轻量化”适配工具,降低“技术门槛”。针对中小企业技术门槛高、成本敏感的特点,应鼓励并扶持SaaS(软件即服务)服务商,开发操作简便、即插即用的文化适配工具。例如,可提供一键生成符合当地文化语境的广告文案、自动审核视觉素材以及智能推荐文化标签等功能,让先进技术红利得以普惠。

再次,推动“全流程”思维渗透,扭转“能力脱节”。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将文化适配的考量,从传统的“营销后端”前置到“产品设计前端”乃至品牌战略层面。在产品开发时,要参考目标市场的文化偏好进行功能微调;在品牌策划时,要构建跨文化理解的品牌叙事。通过培训与案例推广,在企业内部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数据思维的复合型人才,将战略认知转化为落地能力。

最后,完善“多主体”协同生态,补齐“生态支撑”。政府可通过设立专项补贴、提供公共服务采购等方式,降低企业获取专业服务的成本。行业商协会应组织制定重点品类的文化适配指南与最佳实践,推动形成行业标准。平台方则应进一步提高算法规则的透明度,开放更多与文化维度相关的数据接口和分析工具,与卖家共建一个赋能广货行稳致远的健康生态。

广货出海的下半场,是价值的深耕,更是文化的对话。在算法编织的新航道上,加强文化适配能力,实质上是广货安装了精准的“文化导航”与“情感引擎”。这不仅是跨越贸易壁垒的技术手段,更是广东从“制造出海”迈向“品牌出海”与“文化出海”的关键一跃。通过系统性的构建与协同,让每一件广货都承载着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与尊重,我们必将能够激活澎湃而持久的新动能,在全球市场上书写广东智造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

□马俊军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张桂金 张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其产权关系清晰、收益分配合理、农民财产权益保障充分等制度优势,正逐步成为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激活农村资源要素、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深入理解并有效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时代意义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筑牢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必然要求。传统分散的小农经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适应现代化大市场的要求,制约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资源整合、规模经营、产业融合,能有效破解这一困境。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路径,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功能向生态、文化、旅游等多元功能拓展,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而创造出更丰富、更可持续的集体财富源泉。这不仅可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更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构建公平共享发展机制的实践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其特有的产权结构和分配方式,在实践中构建一种有利于成果共享的机制。它通过明晰集体资产产权、量化集体成员股份,既保障了农民作为集体资产所有者的财产权利,又通过按股分红、劳务所得、二次分配等多种形式,让农民能够更直接、更公平地分享集体经济发展的红利。这种制度安排,可有效避免在市场化进程中部分农民因缺乏资本、技能或机会而边缘化的风险,可为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稳定的增收托底机制,有助于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凝聚发展合力的重要支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连接农户与市场、政府的重要纽带,其健康发展能够增强村级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兴办公益事业的能力,从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推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能够有效培育农民的参与意识、契约精神和主人翁意识,增强农村社区的自治能力。这种基于共同经济利益形成的联结,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增进邻里和谐,培育文明乡风、为推进共同富裕营造和谐稳定、充满活力的社会环境,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奋斗合力。

共建共享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

共建共享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深植于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能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从源头上防止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确保每位集体成员平等享有基本生产资料权益。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晰集体与成员间的权责关系、强化利益联结,通过清产核资、折股量化等方式,使农民从抽象的所有者转变为具体的股东,保障农民享有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因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可盘活沉睡的集体资产,又从制度层面保障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的权利。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创新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为农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搭建多元化平台。在产业发展上,集体经济组织引导农民

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多种形式入股。通过发展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不仅创造本地就业岗位,更培养农民的专业技能和市场意识。在治理层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成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通过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确保成员参与集体事务。这种全方位参与机制,既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又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在增收上推动农民收入从单一收入向多元收入转变:通过务工获得“薪金”,通过入股获得“股金”,通过流转土地获得“租金”,通过自主经营获得“现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立的按股分红、按劳分配、二次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既体现效率,又注重公平。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除直接分红外,还可通过兴办集体公益事业、改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要求

聚焦高质量发展,提高增收致富能力。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创新经营模式、提升产业能级。政府应加强产业规划引领,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科学布局特色产业,避免同质化竞争。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创新农村金融服务,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加强基础设施与营商环境建设,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也应积极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引进专业管理人才,探索职业经理人模式,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强化利益共享纽带。建立紧密有效的联农带农机制,是扎实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创新利益联结方式,推动农民更多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一方面,推广“村集体+龙头企业+农户”“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等多元合作模式,引导农户以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入股,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另一方面,加强农民能力建设,通过技能培训与创业扶持提升其参与产业发展的能力。鼓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优先吸纳本地、本村劳动力。此外,应健全风险防控体系,完善农业保险制度,探索设立风险保障基金,并加强审计监督,确保联农带农机制规范、可持续运行。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让广大农民共享农村改革和发展成果。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明确按股分红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既保障农民作为股东的财产权益,又激励其通过劳动参与创造价值。合理设定集体积累与成员分配的比例,确保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制度设计上,要建立健全以股权为基础的分配机制,保障农民享有稳定、透明的分红收益。同时,设立村级公益金,用于帮扶困难群体、改善公共设施和发展公益事业,增强农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监督管理方面,应严格执行“村财乡管”制度,完善财务公开机制,保障村民知情权与监督权,确保收益分配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

作者简介:张桂金,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广东省乡村振兴驻吴川市黄坡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员、驻唐禄村第一书记;张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高级工程师,广东省乡村振兴驻吴川市黄坡镇帮镇扶村工作队队长

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系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护航

行政执法工作面广量大,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要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强化重点领域执法,规范执法程序和行为,实现执法水平普遍提升,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行为中都能看到风清气正、从每一项执法决定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行政执法监督制度是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也是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制度。

国务院公布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机制,行政执法监督是确保行政执法严格规范公正文明的重要防线。《条例》共7章44条,包括总体要求,明确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监督处理、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必将为促进行政执法质效提升提供强大法治保障。

《条例》丰富和发展了法治政府建设理论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点。

从理论层面看,《条例》的出台丰富了我国家权力和法律监督理论和法治政府建设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各种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的内容,强调健全行政监督制度,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强化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条例》的出台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贯彻到行政立法工作中的生动体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就展开了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研究。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参与法治政府建设实践的学者加强对行政法前沿问题的研究,聚焦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制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执法责任制等方面开展学术研究,指导法治实践。《条例》中关于“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以及行政执法监督方式的内容等,都体现了法治政府建设理论研究的成果。

《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的国家层面专门立法,它将法治政府建设的理念和要求贯穿于行政执法监督的全过程,将近年来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的政策要求和改革成果转化为法律规范,实现了行政执法监督从实践探索到主要要素法治化机制的历史性跨越,为法治政府建设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条例》的出台将促进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而行政执法监督则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环节。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比较完善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实现对行政执法工作的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

《条例》将近年来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特别是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从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监督处理、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全要素维度夯实行政执法监督法治化的保障。通过建立健全行政执法监督长效机制,必将促进行政执法质效的提升,从而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如《条例》第11条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应当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督促行政执法机关提升行政执法质效,依法开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给付等工作;第23条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等参加行政执法监督活动。

此外,为做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53条有关内容的衔接,充分倾听企业诉求,保障企业合法权益,《条例》第20条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典型性、代表性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通过涉企行政执法诉求沟通机制、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渠道反映的行政执法问题线索及时进行研判,确定重点监督事项。这些规定都充分体现了,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把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作为执法监督工作的方向和重点,通过加强执法监督,有效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防止执法扰民扰企,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条例》的落实有助于高水平法治政府建设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行政执法工作一直备受关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广东不断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法治政府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但也面临着一些问

题。接下来,广东要以落实《条例》为契机,提高行政执法监督质效,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政府。

适时启动广东地方配套制度的跟进。广东一直走在全国行政执法监督立法的前列。在行政执法监督方面,广东最早的地方性法规是1997年通过、1998年施行的《广东省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后来做了修订,于2016年3月31日修订通过,修订后更名为《广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广东要对照《条例》,适时启动地方法规的修订。要提高行政执法监督标准,继续完善执法标准体系,细化自由裁量基准,压缩执法随意性空间,确保每一项执法行为都于法有据、程序正当。要构建省市县镇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体系,即使是基层的镇街执法行为,也要被纳入严格的监督网络中,解决“神经末梢”监督难的问题。

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推动“互联网+行政执法监督”模式创新,建立执法行为画像模型,精准识别异常执法风险点,提升监督的精准性和时效性。例如,深圳创新设置的“行政执法监督码”制度,给执法行为装上“电子眼”,执法监督主体可精准发现和纠治突出问题,企业也可通过系统提出建议、反映诉求,有效增强获得感。

要坚持系统思维,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与纪检监察、审计监督、信访举报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机制,形成监督合力。此外,还应注重行政执法监督与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有机结合,拓宽监督渠道,鼓励公众参与,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提升行政执法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不断提升行政执法监督质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政府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